



韩国研究丛书

延静
著

永远 的 记忆

山东大学出版社



永远 的 记忆

延静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记忆/延静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607-3380-7

I. 永…

II. 延…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6022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7.75 印张 155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革命年代 第二卷

目 录

第一篇 永远的记忆

楔 子	(1)
一、与外交结缘	(1)
二、初次走进西花厅	(5)
三、第一次走出国门	(8)
四、难忘郝德青大使	(11)
五、初见金日成首相	(14)
六、为毛泽东主席做翻译	(15)
七、随周恩来总理赴平壤	(19)
八、纽约联合国之行	(23)
九、悲痛的日子	(25)
十、邓小平访问朝鲜	(27)

第二篇 历史性抉择

一、一场球赛的思考	(31)
二、意外事件发生	(33)
三、北京申办亚运会	(35)
四、邓小平会见金日成	(36)
五、互设贸易办事处	(37)
六、朝韩加入联合国	(39)
七、轰动汉城的访问	(41)
八、两国关系出现转机	(45)
九、准备启动谈判	(47)
十、建交障碍,台湾问题	(49)
十一、汉城达成建交协议	(51)
十二、中韩建交震惊世界	(52)

第三篇 心中的留恋

心中的留恋	(55)
金天中的生活情趣	(59)
风情独特济州岛	(63)
汉城文化街一瞥	(66)
难忘韩国泡菜	(69)
与书结缘	(72)
——访金大中图书馆	(72)
珍贵的题词	(76)
——金大中祝贺南开中学百年校庆	(76)
再次走进新罗饭店	(80)

韩国掀起汉语热	(84)
海上绿洲	(87)
清溪川新貌	(90)
朴氏兄弟中国情	(92)
韩国的年味	(96)
韩国赏樱	(99)
与潘基文的一次会见	(102)
青南台纪行	(105)
釜山冬柏岛	(108)
韩国女总理印象	(111)
一件旗袍的回忆	(114)
与插花女结友	(117)
高贵中的平凡	(120)

第四篇 生活之浪花

吃花生的联想	(123)
座套遐思	(126)
车流琴声	(128)
——归京琐记	(128)
曼谷没有冬天	(131)
访日散记	(134)
怀念远方的朋友	(138)
一对红金鱼玻璃杯	(142)
季老的融融情怀	(144)
广州的“东北人家”	(148)
遗墨飘香	(151)
——怀念赵朴初先生	(151)

家里的外国人	(154)
“老水电”胡学成	(157)
聊城走笔	(160)
如今朝阳门外	(163)
提倡鞠躬	(166)
在张海迪家做客	(168)
乌兰巴托邓小平的居室	(172)
乌兰巴托的中餐馆	(175)
想 家	(178)
我们的杨通方老师	(181)
婚 宴	(185)
龙 趣	(188)
金日成与茅台酒	(191)
等了五十年的拜访	
——做客从维熙家中	(194)
雨雾中游成山头	(198)
奇特的银杏树	(201)
蝴蝶兰	(204)
作家的艰辛	
——又见张雅文	(207)
喜乘“铛铛车”	(210)
加拿大东部见闻	(213)
我的台湾朋友	(228)
我家窗外	(232)
后记	(235)

第一篇 永远的记忆

楔 子

这是一篇回忆我一段外交生涯的文章。我生长在北京，读小学、中学后，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之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参与主管朝鲜半岛事务。四十多年中，前半主要做翻译，后半做外交官。本文是我前半经历的回顾。从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风采，看到当时中朝关系之密切，还可看到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基点，是努力实现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一、与外交结缘

我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北京读的，可能由于我是独子，受到父母宠爱的缘故，我的书没有读好，或者说没有好好用功读书，现在到了晚年，真的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后悔不已。不过我从中学时开

始,就比较喜欢文学,特别是喜欢动笔写点什么。记得在上高二、高三时,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郑老师,我的作文经常受到他的夸奖,有时还在班上朗读。整个中学时期,我最讨厌的课程是外语。初中时刚解放,各中学都开了俄语课,于是我也学了俄语,起初学得还不错,但随着课程的深入,贪玩儿不用功的我,语法和单字就跟不上了,而且越拉越远,到初三时考试就不及格了。幸运的是,到了高中改学英语,我心里好高兴,像学俄语一样,刚开始时靠着一点聪明,成绩还不错,但也是越深入越糟糕,高中毕业时就又不及格了。所以,毕业前夕,我一心想的是考北京大学学中文,将来当个记者或者当作家,我羡慕的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刘绍棠、从维熙,而死活不能去学外语。

然而,我最不愿意的事情发生了。毕业之前的一天,校长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就考大学的志愿征求我的意见。我如实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沉思良久后说,现在根据国家需要,北大东语系来我校招收学生,准备培养外语人才,如果让我去考,问我愿意不愿意。我一下蒙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校长没有要我立即作出决定,给我两天时间考虑。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校长办公室回到家里的。当时考大学还是比较容易的,除个别学习很差的学生外,一般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考上大学,只是有学校好坏的差别。但我也并不是没有顾虑,因为我的外语太差了,其他的课程也不怎么好,只凭语文一门是没有把握的,万一考不上可怎么办。所以经过两天的考虑,我答复校长同意去北京大学外语,校长当然很高兴。就这样,由组织分配,我

于1954年的秋天走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东语系。

但是,学朝鲜语,对我来说,又是一种偶然。我入东语系那年,有日语、越语、泰语、印地语可以选学,当然也包括朝鲜语。我报的第一志愿是日语,原因很简单,虽然对日本印象并不好,但它在这几种语言中,使用的人口最多,将来可能用处较大。然而最后系里的决定是让我去学朝鲜语,因为报考日语的人太多,不能不分配一些人去学其他语言。虽未如愿,但我也没有什么反感,因为当时抗美援朝刚结束不久,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正处于热潮之中,而且我想,学冷门语言将来于自己的发展也可能更有利。当时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毕业后去做翻译工作,与自己原来想当记者或作家的愿望更接近,或者说没有大的差别。不像有的学生被分配学朝鲜语后情绪不稳定,我毫无怨言地走进学朝鲜语的课堂。

这里我要感谢的是教我们朝鲜语的柳烈老师。从我们班开始,为了提高外语教学水平,北大从平壤请来了一位老师,那就是柳烈先生。他约莫四十几岁,高高的身材,卷曲的头发,面庞颧骨较高,典型的朝鲜人模样。看上去他有些过于严肃,但实际上他对学生十分热情。记得第一堂课,他用汉字把他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之后深深地向学生鞠了一躬。那之后我们逐渐听说,他虽来自平壤金日成大学,但他出身南朝鲜,是小有名气的语言学家,他的发音和语法更接近汉城标准。他从发音起热心地教了我们两年,他的夫人郑老师还辅导我们发音,这给我们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要知道,外语学习这个基础是十分重要的,这对我们毕业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在平壤中国大使馆工作时,还有机会与柳

烈老师多次见面，他还记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秋天，但遗憾的是他的夫人郑老师已经辞世。

这里我更要感谢季羨林老师。我入学时，他是东语系主任。开学的那天，他穿着一身蓝布中山装，参加了我们的迎新会，还给我们讲了话。但老实说，对这位看似普通的中年人，我当时并不了解，只觉得他的讲话听起来很入耳。他特别强调，大学时期对每一个人很重要，要集中精力，学好本领，以便将来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这与当时空喊政治口号的讲话迥然不同，深深渗入我的心灵。这之后我听说，季羨林是一位大学问家，他留学德国十年，师从德国名师，刻苦学习，孜孜以求，不仅掌握了德语，还学会印度文、梵文、图火罗文，研究了印度文学、历史和宗教，三十几岁回国，就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邀请担任北大教授，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那之后，我经常在校园路上或楼道里与他见面，每次他都问寒问暖，特别了解学习情况，鼓励我用功学习，让人感到家长般的温暖。可能就是受了季羨林老师的影响，我一改中学时的学习态度，开始懂得了学习于我的重要，对学外文也不再怩头，而是兢兢业业，刻苦努力，整个大学四年，成绩一直是优等，直到毕业。所以，季羨林是我最尊敬的导师，我一直忘不了他。我在出使韩国期间有幸迎接了前来访问的季老，返回北京之后我又多次去寓所拜见了。

1958年秋天，我和全班同学等待毕业分配。那时不像现在，毕业前很久就开始为自己在社会上了解情况，寻找自己将要进入的工作岗位，而是等待组织的决定。当时中国和朝鲜关系虽然密切，但交往有限，各单位需要朝文干部不多。

加之当时社会上号召大学毕业生到最艰苦的边远地区去锻炼,所以我们班很多人报毕业志愿时,第一志愿都选择了去东北,因为那里有朝鲜族机关、学校、出版社等,需要懂朝文的人去支援。我也不例外,报了去边疆的志愿,并做好了准备。大约一个月后,分配方案正式公布,很多人真的去了东北地区,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和其他两个同学被分配到外交部,而就是这个机遇使我的一生紧紧地与外交工作联系在一起。

二、初次走进西花厅

在我外交生涯刚刚开始时,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1962年秋天,我幸运地走进中南海西花厅,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件事还要从头说起。

北大毕业后,我和其他两个同学分配到外交部,主要是要把我们培养成高级翻译,听、说、写、读、译达到高水平,可以为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为外交文件定稿。拿我们在大学四年学的水平来说,是远远达不到的。于是,在我们到外交部干部司报道后不久就得到通知,干部司已与北大校方谈妥,我们留在东语系进修两年,全面提高外语水平。这样,本以为将步入社会的我们,又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活。

留校进修,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任务。为了达到五会要求,我们每天过着刻板式的生活,除去少许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外,每天从早到晚,从寝室到食堂,从食堂到教室,从教室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再回到寝室,就这样周而复始,没有一刻

休息。我们进攻的目标,除阅读大量外文书籍外,主要是练习口语,提高听力,搞好笔译。学习是枯燥的,但由于任务明确,要求严格,我们丝毫不敢怠慢,竭尽全力去做。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寒暑锻炼,我们的外语水平真的有了不少提高。我们本以为这下可以回外交部正式上班了,谁知干部司又安排我们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实习,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自己。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被借到有关部委去接待朝鲜来访的代表团,在工作中提高翻译水平,这也是干部司提倡的。我先后到文化部、对外文委、体委等部门参加了接待朝鲜代表团的翻译工作,一年中不少时间在外面陪团,自己感觉到外语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1962年秋天,我参加了文化部接待朝鲜文化代表团的工作。这个代表团实际上是一个话剧团,团长是朝鲜话剧学院院长,团员中包括在话剧《红色宣传员》中担任女主角李善子的著名女演员。当年话剧《红色宣传员》在朝鲜十分走红,在全国各地连续上演不衰。剧中的主人公李善子是根据青山里运动中的宣传员李信子真人真事塑造的,主要说明她深入群众,联系实际,宣传党的政策取得成功,当然是有那个时代背景的。一出戏。由于当时中朝关系十分友好,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把该剧目引入中国,在北京上演,主角由一位年轻女演员担任。朝鲜文化代表团来访,主要是指导该剧的演出,同时也到全国各地艺术团体参观和交流。周总理对代表团的来访十分重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入艺看了《红色宣传员》的演出。记得一次看了前半部分,因有要事中途退场,隔一两天后又到剧场看了后半部分。周总

理一向对艺术工作非常关注,对国内艺术演出经常到现场指导,这次朝鲜代表团来京,他当然更是关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朝鲜代表团回国之前,周总理特别邀请朝鲜代表团成员和中方参加《红色宣传员》演出的演员到西花厅他的家里做客,并一起吃午饭。这当然是破格的礼遇,我作为翻译也因此有了第一次进入西花厅的机会。

去之前我的心里是惴惴不安的,因为周总理看戏时我虽为他做了翻译,但因来去匆匆,没有与朝鲜代表团进行多少交谈,而这次是在总理的家里,先交谈,后吃饭,时间几个小时,要完成翻译任务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我为有机会担此重任而深感荣幸,因为那时我才26岁,做翻译也才不过几年,对于我,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西北角,是一座单独的院落,也是建国后周总理的居所。沿着整洁的小路,我和朝鲜代表团走进庭院,出现在眼前的是坐北朝南的暗红色的中式房间,幽雅而宁静。当走进房间时,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迎接客人,一一握手问候。之后落座进行交谈,我坐在总理的身后做翻译。奇怪的是,总理没有坐中间,而是坐在左边的一个单独沙发上,让客人在中间的沙发上入座。后来我为总理做翻译的机会多了才知道,这是总理的一个习惯,是为了尊重客人,也是为了谈话方便。到总理晚年,他干脆让翻译坐在他左边的沙发上,以免得他在谈话时为了照顾翻译听得清楚老得回转身子。

这天总理与朝鲜客人的谈话非常愉快,他赞扬朝鲜《红色宣传员》创作成功,感谢朝鲜艺术家来北京指导我们演出,

并说经过朝鲜代表团的帮助,我们的演出有了很大提高,更重要的是两国艺术家经过交流,加深和发展了两国的友谊。周总理亲切的谈话,特别是邓大姐也在场,而且他们两位对中国演员非常熟悉,可以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所以房间里不时响起一阵阵笑声。谈话之后,总理在客厅旁边一间不大的房间,设午宴招待朝鲜客人。大家落座后,总理指着邓大姐对客人说,她身体不太好,中午需要休息一下,由我来陪大家吃饭。邓大姐向大家致意后退席,总理热情地招待客人。

这天我坐在总理的右手,为了专心地工作,几乎没有吃饭。总理看到眼里,在给客人夹菜的同时,还不止一次给我夹菜并中断谈话给我时间吃点东西,这使我深感不安。这天谈话中还涉及南朝鲜局势,我记得当时由于我不了解情况,翻译时遇到了困难,好在有外交部亚洲司的同志在场,为我下了台。这是我第一次为总理做翻译,虽然没有吃什么饭,翻译也做得很一般,但我深深感到翻译的责任,与外宾的交流,包括谈话的气氛,翻译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天给我上了一堂教育课,终生难忘。

三、第一次走出国门

1963年10月,我第一次出国,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北京与平壤之间有民航班机,也有国际列车,但去使馆工作的人员很少乘飞机,多数都乘国际列车,因为它很舒适、快捷,头一天下午上车,第二天中午就到达。特别是国际列车上都是中国服务人员,又有中国餐车,十分方便。当然所

谓国际列车,也就是两节车厢,一节软卧,一节硬卧,挂在北京至丹东的特快列车后头,到丹东后,两节国际列车过江又挂在朝鲜客车后面直至平壤。我第一次去平壤,选择的就乘这样的国际列车。

因为是第一次出国,出发前我一直比较兴奋。想得最多的是,到使馆做什么工作,自己能不能胜任。为此,我与曾在使馆工作过的同志多次交换意见,结论是服从分配,竭尽全力。我没出过国,父母对我也十分关心,虽然他们年过半百,但身体都还较好,鼓励我到使馆后不要想家,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当时我之所以兴奋,还是因为结婚刚刚一年的妻子谭静正在平壤进修,我将与她团聚。谭静是和我一起分配到外交部的同班毕业生,毕业后进修的三年多时间又朝夕在一起,终结成终身伴侣。想到与她分别一年后团聚,年轻人心情激动也是必然的。

1963年10月下旬,告别到车站送我的父母,踏上出国之路。我乘的是硬卧,但国际列车的硬卧和软卧一样,四人一个房间,只是床不那么软,不过这对第一次出国的年轻人来讲,我感到已是很高的待遇了。可能是兴奋的缘故,这么好的条件,我却几乎一夜没有入睡,母亲眼中的泪花一直伴随着我,直到第二天一早到达边境城市丹东。在这里办完出境手续,等了一个多小时,国际列车跨过鸭绿江大桥,到达新义州,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朝鲜国土。然而当时我没有想到,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不知多少次经由这条线路往返于北京和平壤之间。

国际列车在朝鲜境内只运行了四个小时就到了平壤,使

馆办公室主任张志民来接我。乘车去使馆的路上，他不断地向我介绍沿途的建筑。平壤街道宽阔，建筑宏伟，行人穿着整洁，举止彬彬有礼，给我的印象很深。特别是想到朝鲜战争中，平壤曾被夷为一片废墟，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取得如此的发展，不能不令人钦佩。这是朝鲜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经过斯大林大街，转过千里马铜像，再走不远就到了中国大使馆。我被安排住在三楼，刚进房间放下行李，在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使馆武官处的赵嗣安等就来看我，多年后在异国相见，甚为高兴，晚饭后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谈到深夜。

中国大使馆位于平壤市北部牡丹峰区抗美洞，是一个偌大的院落。面向正门的主楼四层，一二楼为办公室，三四楼是宿舍住人，北侧的辅楼是一个大宴会厅，有一个通道与主楼相连，但客人可以从另一个门直接入内。院子西侧有一个不小的游泳池，院子后面是一座小山，树木十分茂密。这座建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8 年撤出朝鲜之前用很短时间建成的，除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位于市内金日成曾住过的老首相府后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外，就要数中国大使馆了。

我被分配在使馆办公室工作，担任大使翻译和使馆对外礼宾交际工作。使馆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全新的，一切要从头学起做起。我开始工作后的第一个感觉是，使馆的工作十分繁忙。由于中朝关系密切，两国领导人来往很多，当时刘少奇主席又刚刚访问过朝鲜，两国关系处于热潮中，大使和外交官的对外活动很多。特别是我任大使翻译，每天都要外出，回来要写简报，加上还要做对外联络和礼宾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这样工作有时还是干不完，但我觉得工